

政府资助、使命偏离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研究

杨 敏¹, 李 健²

(1.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新征程,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深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客观需要。基于 2012—2021 年全国 414 家基金会的 1 958 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及制度环境、政治属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显著促进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2)机制分析发现,政府资助通过引发使命偏离,促进社会组织有意识的战略调整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3)异质性分析表明,“支持型”“限制型”制度环境下政府资助均对组织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二者差异不显著;而具备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其政府资助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要优于无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反映出政治属性在政府资助过程中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强化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政社关系的理论认知,也在实践层面为政府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关键词:政府资助;使命偏离;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45;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5)04-0074-15

Government funding, mission drif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foundations

YANG Min¹, LI Jian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phas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deepening social governance, enhancing public services, and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958 observations of 414 foundations across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ssion drift and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olitical attribu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Government fund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funding induces mission drift, which drives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reby advanc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meanwhile,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governmental backgrounds exhibit better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when

收稿日期:2025-01-30 修回日期:2025-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8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374235)。

作者简介:杨敏(1998—),女,江西宜春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公益慈善。通信作者:李健。

the funding dependency is higher, indicating that political attributes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funding through the dependency pathway. This research not only deepen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society relation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policy references for fost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government funding; mission drift; social organizat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自2012年起,中央财政就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各地政府陆续也通过专项资金、财政扶持专项以及项目奖励等多种途径,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1]。2021年,民政部印发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不断完善对社会组织的投入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2024年,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推动落实社会组织相关政策和优惠待遇,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由此,深入探讨政府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学术界密切关注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特别提供资助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诸多文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管理效率、内部控制影响等单一变量的影响^[2-4]。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体现在社会组织规模更加适当、结构更加合理、治理更加有效,包含自足性、自主性和参与性3个维度^[5],目前较少有文献从高质量发展目标出发,考察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关注到政府资助影响社会组织的机制,并提出了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等多种理论假设模型^[6-7],但却忽略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在实践中,许多社会组织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资助,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发起、指导、控制和承担国家资助活动的总体战略责任^[8]。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社会认知及相应的战略调整会对组织产生不同的影响

结果。既有研究对此往往缺乏关注。

随着以往由国家提供的福利服务被广泛外包给社会组织,许多社会组织在其最初使命规定之外的领域开展业务。近年来,与使命偏离相关的问题在非营利研究文献中受到了密切关注。学者主要研究了使命偏离如何发生,并认为政府资助是社会组织使命偏离的主要威胁^[9]。在使命偏离的影响效应方面,以往研究产生了初步但模棱两可的见解。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家诱导的使命偏离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可能会破坏社会组织的精神、自治和性质,无法帮助该组织最初和最需要帮助的客户^[10],带来捐助者关系的紧张^[11]以及破坏组织财务稳定性^[12]。另一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使命偏离似乎给一些社会组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13]。通过承担远远超出其现有使命范围的合同工作,社会组织可以发展其竞争力,扩展其能力,以跟上公共政策的新发展^[14],有时还可以参与政治决策^[15]。在使命偏离的组织应对方面,已有学者发现,近年来随着资源的减少,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采取同构机制,通过将其使命宣言与政府支持的领域保持一致来寻求政府的支持^[16]。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识别出使命偏离的多样性。比如将组织使命无意识的转移称为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而组织有意识追求收入的转移则称为使命蠕变(mission creep)^[17]。尽管如此,人们对使命偏离的类型与对社会组织的差异化影响之间的关系依然知之甚少。

综上,已有文献对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讨论存在一定争议,较少文献关注到社会组织对于政府资助的能动性策略,并从使命偏离类型和影响角度展开讨论。此外,既有使命偏离文献主要从负面批判角度展开,其底层逻辑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化思想,排斥政府对社会组织运作的干预。而我国社会组织接受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共同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使命,这与西

方国家存在着根本区别。如果不加区分地以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实践,极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

本文通过科学完善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深度剖析了使命偏离和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首先,丰富了有关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当前有关社会组织高质量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规范性描述层面^[18-19],对于政府支持行为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性探讨。本文从政府资助行为这一关键支持举措出发,实证分析了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其次,将使使命偏离引入政社关系的研究框架中。现有研究虽关注到政府行为对社会组织的外部影响,但鲜有研究将社会组织的宗旨和目标调整纳入政社互动关系的视阈下考察。本文在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资助—使命偏离—战略调整”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组织在面对政府资助时可能出现的主动或被动战略选择行为。这个框架不仅有助于揭示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组织发展目标之间的互动逻辑,也为实现国家战略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撑。最后,本文引入制度环境的动态性视角,考察了政府不同监管强度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处于积极引导与严格监管并行的政策阶段,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不同时期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优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提升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高效率、公平性和绿色可持续为核心的综合发展模式^[20]。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资源利用的高效性、治理结构的规范化、服务功能

的专业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等多个维度^[21],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支持^[19]。政府资助作为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社会组织的日常运行与长远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政府资助在社会组织资源保障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不仅增强了社会组织的财务稳定性,还有效规避了因资金短缺导致的项目中断风险。同时,政府资金的注入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外部支持,能够帮助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上解决关键问题,提升服务项目的精准性与运营效率^[14]。另一方面,政府资助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供给,有助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而政府通过专项资金和政策协同,为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22]。

另外,政府资助还通过政策引导作用,推动资源向公共需求最为紧迫的领域集中,从而间接优化了社会组织服务的整体质量与效能^[19]。比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专项资金、财政扶持政策以及项目奖励等形式,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关键的激励与制度保障^[14,23]。在政府资助下,社会组织逐渐从单一的资源接受者转变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主体,不仅及时响应了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还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24]。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承担了政策执行职责,还通过创新实践丰富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彰显了政府资助对提升组织能力与推动战略发展的独特价值。政府资助还有利于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25]。接受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通常需要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与财务监督机制,并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接受严格的审计和问责^[3]。这一“寓管理于服务”的特色机制,不仅增强了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与专业性,也显著提高了其运营效率和社会信任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推动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展现出更高的专业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治理保障^[26]。为此,政府资助带来的制度化管理体系不仅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运营效

率,还促使社会组织在服务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价值的创造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进而推动其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二)使命偏离的中介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资助所引发的社会组织使命偏离并非简单的目标偏离现象,而是一种在党和政府引导下的有序战略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与西方学界普遍将“使命偏离”视为负面现象的观点截然不同,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社关系逻辑^[27]。组织使命通常指社会组织明确意识到的长期目标和社会责任,体现了社会组织存在的根本意义和追求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有意识的使命偏离意味着具有清晰目标导向和明确社会价值取向,能够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13]。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在获得资助后,通常会对其人力资源、技术支持和服务模式进行重新规划,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及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战略性调整不仅提升了组织的治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还增强了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性和影响力^[28]。与此同时,有意识的社会组织还会充分利用政府资助的规范化监管机制,明确组织在政策框架内的发展方向,使其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减少因不必要的调整所带来的发展风险^[26]。相对而言,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则表现为社会组织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或目标引导,导致资源配置无明确方向,从而引发目标模糊和资源浪费等问题^[29]。在有意识调适与无意识偏离的双重情境下,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使命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对其高质量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17]。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使命偏离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线性的干预与反干预过程,而应视为国家社会治理需求与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互动协同的产物^[30]。政府资助通过传递政策信号,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有序的使命调整,使其在优化治理结构和提升运作效能的同时,能够有效

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增强其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对使命目标的主动调适,不仅提升了其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响应能力,也为其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政府资助通过引导组织使命偏离,优化治理与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

(三)制度环境与政治属性的异质性作用

制度环境作为社会组织与个体行为的制度性框架,深刻影响了组织内部资源配置、权利义务的界定以及行为规范的形成。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可分为支持性制度环境与限制性制度环境,其政策弹性和监管强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治理效率与服务能力等关键领域的功能^[31]。具体而言,支持性制度环境通常表现出较高的政策灵活性与较低的监管成本,有助于社会组织在资源动员与管理效率方面取得优势,为其健康运行与长远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该环境中,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利用政府资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为实现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制度优势,进一步推动服务的专业化与多元化发展^[32]。相比之下,限制性制度环境通常体现为政策制定的刚性增强与监管强度的提高,带来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33]。在这个环境中,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项目执行及战略调整方面常受到诸多约束,不仅降低了其治理效能与组织灵活性,还可能削弱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能力^[6-7]。同时,过度的监管压力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风险规避倾向,使其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或迅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时反应迟缓、应对能力不足,从而限制其作用发挥^[34]。

此外,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政治属性(是否具有政府背景)是影响其发展路径与治理方式的重要因素^[35]。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组织的持续运作与战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获取,而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争取公共资源方面通常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相较于民间背景的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在获取政府资助与政策支持方面更具便利性,因而在

资源配置效率、项目执行能力及组织韧性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发展动能^[31]。同时,政治属性对于组织合法性的建构亦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治资源嵌入方面更为明显,其领导团队因对政策导向的敏感性与响应能力较强,能够在动态制度环境中展现出更高的战略适应性与治理稳定性^[36]。另外,政治属性还显著提升了组织的政策倡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通过制度性政治嵌入,这类组织在政策议程设置与协同治理中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而扩大服务供给范围、提升服务品质,并在多元共治格局中彰显其制度价值与社会功能^[3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a:制度环境的宽松程度影响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型制度环境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更高;假设 H3b:政治属性影响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资助下表现出更高的发展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在数据初步收集阶段,本研究团队收集了超过两万条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数据,涵盖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 3 类组织。但在后续筛选过程中,发现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据存在较多的离群值和缺失值,无法满足实证数据要求。鉴于基金会具有较为规范的财务披露和较高的运营透明度,其数据具备较好的可靠性和全面性,因此本研究专注于基金会这一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研究对象涵盖了 2012—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除港澳台)共 414 家基金会的面板数据,通过数据清理,最终获得 1 958 条有效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目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程度的衡量多采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估。毛佩瑾^[19]认为其应包括发展成效、专业能力和社会价值实现等维度;冯怡等^[38]强调党建引领、组织专业化和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性;郭施宏^[39]从治理能力、经济基础、

服务能力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围绕财务稳健性、运营管理能力与公益绩效三大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详见表 1。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本文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测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通过计算各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确定其信息熵,离散程度越高,信息熵越低,其对应指标的重要性越高。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实现权重分配的客观性和量化性^[40]。其中,财务稳健性维度包括财务灵活性、财务稳定性、净资产合计及投资回报率,能够衡量组织的资产结构与资金安全性;运营管理能力维度包括评估等级、财务运行效率、风险应对能力与员工队伍专业化程度,反映组织治理与运行效率;公益绩效维度则通过公益支出增幅与捐赠收入增速,评估组织的服务能力与社会价值创造力。最终,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根据各项指标加权汇总计算得出,能够全面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表 1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熵权法/%
财务稳健性	财务灵活性	非限定性净资产/限定性净资产	15.80
	财务稳定性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1)	10.20
	净资产合计	净资产合计	8.90
	投资回报率	投资收益/总投资额	10.60
运营管理能力	评估等级	基金会评估等级	6.80
	财务运行效率	总收入/年度总支出	17.50
	风险应对能力	货币资金/流动负债	9.90
	员工队伍专业化程度	全职员工数量/(志愿者数量+全职员工数量)	7.20
公益绩效	公益支出增幅	(本年度-上年度)/上年度公益支出	8.90
	捐赠收入增速	(本年度-上年度)/上年度捐赠收入	4.20

2. 解释变量

政府资助。当前,学界关于衡量政府资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政府资助的绝对金额,这项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规模,并为不同规模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比较提供可比性^[41-42];二是采用政府资助依赖度,即政府资助金额与社会组织年度总收入之比($\text{govfund} = \text{政府资助金额} / \text{年度总收入}$)。这一比率指标能够揭示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

度,有助于评估政府资助在资源配置、运营管理及战略决策中的长期影响^[43]。考虑政府资助的规模效应与依赖程度,本文综合采用这两种衡量方式(分别命名为 govfund1 和 govfund2),以全面评估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3. 中介变量

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下,社会组织会出现不同类型的使命偏离,具体可划分为有意识的使命偏离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配置调整的战略主动性与非战略被动性,前者体现为社会组织基于内部战略规划所做出的主动性调整,后者则表现为在外部压力驱动下的非战略性响应。有意识的使命偏离是指社会组织为提升治理绩效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动对资源进行再配置的过程。这类调整通常体现在组织对管理性支出的有意增加,以增强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及强化组织稳定性。比如,在获得政府资助后,组织可能将部分资源投入于员工能力建设、内部制度完善、信息系统升级以及基础设施改进等领域,从而在中长期内提升其服务绩效与社会影响力^[12-13]。这类资源再配置行为体现了组织在面临外部支持时所展现出的战略理性,强调通过治理结构与运营机制的优化来增强组织在不确定制度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韧性。其中,管理性支出是指社会组织年报中所界定的用于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与专业能力的战略性投入,不包括一般性行政事务开支或与筹资活动相关的运营成本。这一区分有助于准确识别组织是否将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关键治理要素,而非短期内的运维消耗。

相较之下,无意识的使命偏离是指社会组织在外部制度压力或资源约束下被动进行资源再分配,其调整行为缺乏清晰的战略导向,往往是对政府资助附加条件或市场竞争压力的消极应对。这种偏移可能导致组织资源从核心公益项目转移至如筹资活动、人员福利、日常行政等非核心领域,从而造成公益性支出的相对萎缩^[9]。这一过程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资金紧张问题,但从可持续角度来看,会削弱组织在核心领域的服务能力与

公益价值,进而影响组织使命与公众信任的维系。

本文选取管理费用占比与公益支出占比的倒数作为衡量有意识与无意识使命偏离的测度指标,以捕捉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上的战略性与非战略性行为特征。具体而言,管理费用占比的上升反映了组织在治理能力与内部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主动性投入,体现出战略导向下的有意识使命偏离。而公益支出占比的下降则体现了组织资源被动转移至非核心职能领域,反映了在外部约束下的无意识使命偏离。图1反映了政府资助通过不同类型使命偏离间接影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图。这一框架强调有意识的使命偏离表现为组织在政策激励下对治理结构与能力建设的主动调整,有助于增强组织韧性与可持续性。而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则体现为组织在适应外部制度压力过程中对核心公益目标的边缘化倾向,可能会削弱组织使命聚焦与公众信任基础。基于这一识别逻辑,本文引入双中介模型,将管理费用占比和公益支出占比的倒数分别作为中介变量,以探究政府资助通过不同类型使命偏离路径作用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机制。

4. 异质性变量

一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社会组织行为与绩效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其特征变化构成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约束与支持条件^[44]。目前制度环境测量方法主要包括3类:第一,政策断点法,通过设定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实施前为0,实施后为1),识别制度环境变化的时间节点及其效应,广泛用于政策效果评估^[45];第二,制度环境指数法,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进行多维量化测量^[46];第三,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利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指标权重,构建制度环境量表以实现综合测量^[47]。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政策断点法,将2016年界定为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转型的关键节点,以此构建制度环境虚拟变量(2016年前赋值为1,2016年及以后赋值为0)。选择这一时间节点的依据如下:这年国家出台了社会组织领域的3项重要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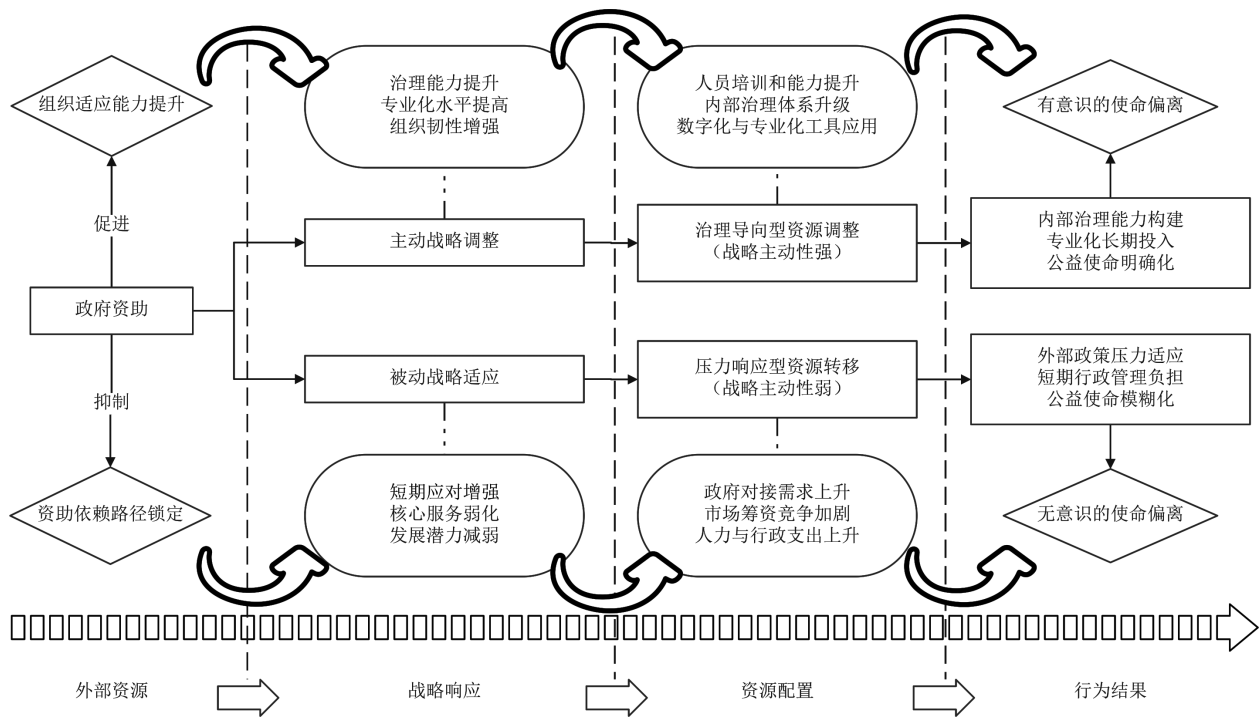


图1 使命偏离类型的生成逻辑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这3项政策被业界认为是社会组织监管由宽松到趋紧的关键风向标,标志着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重大转向^[48]。为此,本文选取2016年作为制度属性变量的界定节点,有助于识别制度环境变化对社会组织运行状态及发展路径的潜在影响,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制度层面的逻辑支撑与识别基础。

二是政治属性。本文以基金会管理层中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数量作为测度指标,并据此构建虚拟变量:若组织中有管理者曾任省部级领导职务,则赋值为1,反之为0。管理层的政治背景体现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联程度,直接影响组织在资源获取、政策执行和制度适应方面的能力。拥有省部级领导经历的管理层成员能够凭借其政治资本和制度优势,在政策资源配置、政府合作网络拓展及信息获取等方面为组织提供支持。具体而言,具有强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通常在争取政府资助、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其所能调动的政策资源和制度渠道有助于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与服务

供给能力。已有研究指出,具有强政府背景的组织能够凭借其政治网络在政策议程设置、公共资源分配与制度性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扩大其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增强其制度性话语权^[49]。因此,本文将管理层中拥有省部级领导任职经历的人数作为衡量社会组织政治属性的指标,以全面反映其资源禀赋和制度优势。

5. 控制变量

借鉴Lu^[50]、毛佩瑾^[19]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基金会类型,对于社会组织的内部运营模式和外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基金会是否具有公募资格来衡量;②全职员工数量,是衡量社会组织人力资源规模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其组织能力与资源投入情况;③志愿者数量,反映了社会组织的外部资源动员能力,能够体现组织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和公众参与度;④重大公益项目数,能够反映社会组织在核心服务领域的项目承接能力以及服务广度,对于组织的运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⑤评估等级,是衡量社会组织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其在运营规范性、透明度及绩效方面的整体表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程度	通过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得分来衡量	1 958	0.053	0.016	0.005 1	0.165
政府资助1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金额(亿元)	1 958	0.016	0.060	0.000 02	1.5
政府资助2	政府资助金额占社会组织总收入的比重	1 958	30.79	30.11	0.1	100
有意识的使命偏离	管理费用/总费用	1 958	43.68	25.55	0	1
无意识的使命偏离	1/公益支出占比	1 958	0.629	1.548	1	12
制度环境	2016年前赋值为1,2016年及以后赋值为0	1 958	0.656	0.475	0	1
政治属性	管理层担任省部级职务人员数量	1 958	0.306	2.412	0	32
基金会类型	公募或非公募(1,0)	1 958	0.870	0.337	0	1
全职员工数量	全职员工数	1 958	5.592	15.353	0	129
志愿者数量	志愿者数/10 000	1 958	0.027	0.144	0	2.264
重大公益项目数	年度开展重大公益项目数	1 958	2.054	3.445	0	24
评估等级	基金会的评估等级(分别为1~5星级)	1 958	2.209	2.033	1	5

(三)模型构建

鉴于研究数据同时包含个体(基金会)与时间(年份)两个维度,存在潜在的跨个体与跨时期异质性,为有效控制不可观测的固定因素所导致的遗漏变量偏误,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模型为:

$$HQD_{it} = \alpha_0 + \alpha_1 govfund_{it} + \xi_1 X_{it} + \lambda_t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i 、 t 分别代表基金会序号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HQD_{it} 表示第 i 个基金会在 t 年的高质量发展程度;自变量 $govfund_{it}$ 为政府资助依赖程度; X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基金会的组织规模、评估等级、专业化程度等;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其中,模型中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λ_t)和个体固定效应(δ_i)。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变动及其他时间趋势因素的影响,从而避免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性偏误。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基金会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包括基金会自身特征(如治理结构、运营模式、资源获取能力等)对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潜在干扰。此外,本文采用基金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方法,以应对个体层面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进一步增强回归分析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1)进行了回归,表3中列(1)、列(3)与列(2)、列(4)分别是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后,不加入控制变量与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1)中,政府资

助金额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90 6且在1%水平上显著;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系数为0.089 3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政府资助比例对高质量发展,列(3)与列(4),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9 2和0.009 1,均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这表明,政府财政支持不仅能够优化社会组织的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还增强了组织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以此促进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这一发现与Yu等^[26]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政府资助通过强化资源保障、提升组织专业化能力,进而助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1	0.090 6 *** (2.922 9)	0.089 3 *** (2.878 5)	—	—
政府资助2	—	—	0.009 2 *** (3.639 8)	0.009 1 *** (3.611 0)
基金会类型	—	-0.043 3 *** (-3.778 2)	—	-0.044 7 *** (-3.862 9)
全职员工数量	—	0.009 1 *** (3.202 5)	—	0.009 4 *** (3.304 5)
志愿者数量	—	0.765 9 (1.154 2)	—	0.709 4 (1.066 8)
重大公益项目数	—	-0.000 1 (-0.579 8)	—	-0.000 1 (-0.646 0)
评估等级	—	-0.006 2 *** (-5.146 2)	—	-0.006 3 *** (-5.166 1)
常数项	0.023 8 *** (57.811 9)	0.076 7 *** (7.798 9)	0.017 1 *** (7.855 0)	0.071 2 *** (7.091 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2	0.389 1	0.389 2	0.392 0	0.392 1

注: *、**、*** 分别表示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时有统计意义;括号内均为 t 检验。下同。

(二) 内生性检验

为验证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政府资助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分别滞后一年和两年进行回归。若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则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政府资助的回归系数应显著。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未能支持双向因果关系的存在(见表4)。

表 4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因果检验

变量	(1) 政府资助 1	(2) 政府资助 2	(3) 政府资助 1	(4) 政府资助 2
高质量发展 (滞后一期)	-0.010 5 (-0.418 1)	-0.302 2 (-0.799 4)	—	—
高质量发展 (滞后二期)	—	—	-0.007 9 (-0.244 9)	-0.596 2 (-1.387 6)
基金会类型	-0.007 7 (-0.532 7)	-0.489 8 ** (-2.247 5)	0.013 5 (0.634 6)	0.279 6 (0.985 1)
全职员工数量	0.001 8 (0.644 8)	0.093 5 ** (2.188 8)	-0.002 7 (-0.443 9)	-0.059 6 (-0.749 2)
志愿者数量	2.495 9 *** (3.697 7)	36.404 0 *** (3.587 3)	-0.015 9 (-0.955 4)	-0.318 3 (-1.436 4)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4 *** (-2.795 9)	0.000 8 (0.347 4)	-0.000 6 *** (-3.037 9)	0.001 8 (0.711 6)
评估等级	0.003 7 (1.092 5)	0.089 7 * (1.752 7)	0.006 1 ** (2.304 4)	0.068 9 ** (1.971 6)
常数项	-0.004 2 (-0.705 2)	0.108 1 (1.200 7)	-0.001 7 (-0.208 9)	-0.002 7 (-0.025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072	1 072	837	837
R ²	0.954 9	0.833 2	0.964 8	0.853 9

此外,为解决样本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问题,本研究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内生性检验(见表5)。在第一阶段的 Probit 回归模型中,本文将基金会类型、全职员工数量、志愿者数量、重大公益项目数、评估等级、负债总额、资产总额等变量纳入模型,以估算逆米尔斯比率(MILLS)。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加入逆米尔斯比率后,回归系数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上述结论在控制自选择偏误后依然稳健。

(三)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检验。首先,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减少异方差的影响,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

残差方差,将其倒数作为权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见表6)。其次,为控制遗漏变量偏误,在模型中增加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等变量,结果表明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仍显著。最后,本文还对高质量发展变量进行了重新测度,新增资金使用效率(预付账款/待摊费用)维度,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资助的影响依旧稳健。上述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

表 5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087 6 *** (2.761 3)	—
政府资助 2	—	0.009 3 *** (3.669 4)
MILLS	-0.433 5 (-0.587 0)	0.037 9 (1.129 8)
基金会类型	-0.047 6 *** (-3.517 5)	-0.037 7 *** (-2.889 6)
全职员工数量	0.009 9 *** (3.108 0)	0.007 8 ** (2.431 7)
志愿者数量	0.317 6 (0.315 7)	1.182 7 (1.511 2)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0 (0.039 5)	-0.000 2 (-0.899 9)
评估等级	-0.007 3 *** (-3.274 0)	-0.005 1 *** (-3.288 0)
常数项	0.425 7 (0.716 0)	0.049 5 ** (2.287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1 958	1 958
R ²	0.389 4	0.392 6

为了保证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选择了0.30、0.60和0.90三个分位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在三个分位点上均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

(四) 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模型(1)和模型(5)检验政府资助对有意识的使命偏离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958 4和0.123 5,分别

表 6 更改模型和增加控制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更改模型		增加控制变量		更改变量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5) 重新测度的高质量发展	(6) 重新测度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037 7 *** (6.467 4)	—	0.087 3 *** (2.732 6)	—	0.142 6 *** (2.613 6)	—
政府资助 2	—	0.004 0 *** (3.442 4)	—	0.009 4 *** (3.691 8)	—	0.016 6 *** (3.573 3)
基金会类型	0.000 9 (0.866 9)	0.001 1 (1.098 8)	-0.043 0 *** (-3.781 2)	-0.044 4 *** (-3.883 6)	-0.060 7 *** (-2.714 5)	-0.063 3 *** (-2.831 5)
全职员工数量	0.000 1 (1.553 6)	0.000 1 *** (2.749 3)	0.008 8 *** (3.108 0)	0.009 1 *** (3.205 9)	0.012 7 ** (2.339 3)	0.013 3 ** (2.447 3)
志愿者数量	0.005 8 ** (2.438 0)	0.006 3 ** (2.401 5)	0.756 9 (1.134 3)	0.689 9 (1.033 6)	1.105 9 (0.946 0)	0.966 9 (0.829 3)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1 (-0.841 0)	-0.000 0 (-0.214 2)	-0.000 1 (-0.819 1)	-0.000 1 (-0.898 6)	-0.000 3 (-1.320 2)	-0.000 4 (-1.369 8)
评估等级	0.000 4 ** (2.377 9)	0.000 5 *** (2.990 0)	-0.006 2 *** (-5.171 0)	-0.006 3 *** (-5.217 1)	-0.009 9 *** (-4.397 0)	-0.010 2 *** (-4.472 1)
负债总额	—	—	-0.000 0 (-1.056 0)	-0.000 0 (-1.212 6)	0.000 0 (0.358 8)	0.000 0 (0.316 5)
资产总额	—	—	0.000 3 * (1.848 9)	0.000 4 ** (2.214 6)	0.000 0 (0.107 8)	0.000 1 (0.450 1)
常数项	0.049 9 *** (48.377 2)	0.048 3 *** (41.689 5)	0.076 6 *** (7.821 2)	0.071 1 *** (7.108 7)	0.108 0 *** (5.834 1)	0.098 2 *** (5.216 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i>R</i> ²	0.034 1	0.018 4	0.390 7	0.394 0	0.247 2	0.251 5

表 7 分位数检验结果

变量	Q30		Q60		Q90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5) 高质量发展	(6)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042 7 *** (6.415 1)	—	0.054 4 *** (5.965 8)	—	0.051 7 *** (4.092 1)	—
政府资助 2	—	0.004 6 *** (3.224 9)	—	0.006 5 *** (3.516 3)	—	0.006 1 ** (2.492 1)
基金会类型	-0.000 5 (-0.403 3)	0.000 2 (0.186 3)	0.001 1 (0.619 4)	0.001 9 (1.135 6)	0.001 3 (0.588 2)	0.001 0 (0.495 0)
全职员工数量	0.000 1 * (1.894 8)	0.000 1 ** (2.194 5)	0.000 1 *** (2.870 0)	0.000 2 *** (4.136 6)	0.000 3 *** (6.698 0)	0.000 4 *** (7.291 5)
志愿者数量	0.006 8 ** (2.517 4)	0.007 2 *** (2.615 2)	0.007 0 * (1.880 4)	0.007 7 ** (2.128 6)	0.001 9 (0.362 5)	0.000 6 (0.118 0)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1 (0.467 6)	0.000 2 (1.369 8)	0.000 2 (0.905 8)	0.000 2 (0.953 1)	-0.000 3 (-1.429 0)	-0.000 2 (-0.760 6)
评估等级	0.000 8 *** (3.840 3)	0.000 9 *** (3.905 2)	0.000 0 (0.112 3)	0.000 4 (1.348 0)	-0.000 0 (-0.055 7)	0.000 3 (0.865 7)
常数项	0.032 5 * (1.919 9)	0.024 6 (1.435 6)	0.039 4 * (1.701 5)	0.029 8 (1.328 9)	0.070 2 *** (32.263 4)	0.017 5 (0.562 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i>R</i> ²	0.061 3	0.056 6	0.046 9	0.040 6	0.039 5	0.041 0

表 8 使命偏离的中介回归结果

变量	(1)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2) 高质量发展	(3)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4) 高质量发展	(5)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6) 高质量发展	(7)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8)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958 4 * (1.908 2)	0.084 6 ** (2.420 1)	-6.987 4 ** (-2.163 4)	0.053 8 *** (4.297 0)	—	—	—	—
政府资助 2	—	—	—	—	0.123 5 ** (2.403 4)	0.008 6 *** (3.262 8)	-0.698 2 *** (-2.675 6)	0.007 1 *** (4.904 7)
有意识的 使命偏离	—	0.004 9 *** (2.706 0)	—	—	—	0.004 5 ** (2.495 6)	—	—
无意识的 使命偏离	—	—	—	-0.000 4 ** (-2.338 6)	—	—	—	-0.000 4 ** (-2.112 6)
基金会类型	-0.079 1 *** (-2.942 7)	-0.042 9 *** (-26.498 0)	-0.334 6 * (-1.901 3)	0.000 5 (0.374 0)	-0.101 1 *** (-3.574 9)	-0.044 2 *** (-27.035 7)	-0.234 4 (-1.359 4)	0.000 4 (0.229 2)
全职员工数量	-0.081 9 *** (-9.359 9)	0.009 5 *** (17.711 1)	0.234 9 *** (4.187 7)	0.000 2 ** (2.292 6)	-0.076 3 *** (-8.551 5)	0.009 8 *** (18.290 4)	0.208 2 *** (3.958 6)	0.000 2 ** (2.426 6)
志愿者数量	12.507 1 *** (10.921 3)	0.705 0 *** (8.979 5)	-9.842 7 (-1.410 2)	0.005 7 *** (4.651 5)	11.329 2 *** (7.985 8)	0.658 0 *** (8.407 0)	-5.763 9 (-0.771 4)	0.006 3 *** (3.933 4)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7 6 *** (-3.593 7)	-0.000 0 (-0.306 4)	0.033 0 ** (2.254 1)	-0.000 0 (-0.079 0)	-0.007 7 *** (-3.643 1)	-0.000 1 (-0.378 0)	0.033 8 ** (2.366 1)	-0.000 0 (-0.014 8)
评估等级	-0.074 8 *** (-25.633 8)	-0.005 8 *** (-23.161 0)	-0.028 4 (-1.360 7)	0.000 2 (0.912 2)	-0.076 9 *** (-23.464 4)	-0.005 9 *** (-24.055 5)	-0.022 9 (-1.194 4)	0.000 6 ** (2.406 7)
常数项	0.712 8 *** (38.541 9)	0.073 2 *** (44.389 1)	0.571 9 *** (4.562 8)	0.036 8 *** (7.339 9)	0.641 6 *** (20.311 6)	0.068 3 *** (34.678 4)	0.992 2 *** (5.062 0)	0.025 2 *** (4.766 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1 958
R ²	0.484 6	0.392 4	0.435 9	0.345 5	0.487 5	0.394 9	0.437 6	0.196 8
Sobel Z	—	2.563	—	1.918	—	2.646	—	1.865
Sobel Z-p 值	—	0.010 381 18	—	0.055 066 33	—	0.008 154 02	—	0.062 223 48
Bootstrap Z	—	2.02	—	1.94	—	2.60	—	2.53
Bootstrap 置信区间	—	[0.020 523 7, 0.067 506 6]	—	[0.023 824 7, 0.058 921]	—	[0.001 390 2, 0.006 021 8]	—	[0.002 291 7, 0.006 085 2]
中介效应占比	—	0.049 702 59	—	0.024 487 15	—	0.065 383 23	—	0.056 883 91

在 10%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资助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组织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其次,模型(2)和模型(6)在控制有意识的使命偏离的情况下,检验政府资助与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资助 1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84 6,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4 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政府资助 2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8 6,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4 5,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模型(3)和模型(7)检验了政府资助对无意识的使命偏离的影

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6.987 4 和 -0.698 2,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资助显著抑制了社会组织的无意识的使命偏离。此外,模型(4)和模型(8)在控制无意识的使命偏离的情况下,检验政府资助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政府资助 1 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53 8,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0 4,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政府资助 2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7 1,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00 4,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而政府资助则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这一负面作用。最后,本文采用 Sobel 检验与 Bootstrap 检验对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结果显示,Sobel 检验的 Z 值分别为 2.02、1.94、2.60 和 2.53,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同时,Bootstrap 检验所构建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零,进一步验证了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的中介机制作用,假设 H2 得到验证。具体而言,政府资助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有意识的使命偏离,增强了组织的战略导向与目标聚焦能力,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绩效,显著推动了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同时,政府资助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组织无意识的使命偏离,减少了因外部资源压力导致的核心目标弱化现象,降低了组织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战略失焦与治理失效风险^[26]。

(五)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检验

在支持和抑制两种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资助 1 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056 2(支持型)与 0.056 8(限制型),且两者系数差异不显著(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观察政府资助 2 的回归系数可发现,政府资助 2 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同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8 2(支持型)与 0.004 6(限制型),两者系数差异同样不显著(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制度环境在政府资助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过程中未起到差异性影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资助本质上是外部资源支持,由政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这种稳定的资源支持会降低社会组织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另外,社会组织在使用政府资金时,面临着高度的绩效考核约束,无论制度环境如何,资金的运用方向和绩效要求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见表 9)。

2. 基于政治属性的异质性检验

根据表 10 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社会组织是否具备政府背景,政府资助 1 均显著

表 9 制度环境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支持型 - 限制型		支持型 - 限制型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056 2 *** (3.822 7)	0.056 8 *** (2.736 5)	—	—
政府资助 2	—	—	0.008 2 *** (4.465 2)	0.004 6 ** (2.170 1)
<i>bdiff_test</i> <i>P-value</i>	0.001 ($p=0.496$)		0.003 ($p=0.110$)	
基金会类型	0.002 3 (1.412 3)	-0.002 1 (-1.045 6)	0.002 2 (1.008 3)	-0.001 8 (-0.867 5)
全职员工数量	0.000 2 ** (2.246 1)	0.000 0 (0.841 0)	0.000 2 ** (2.358 5)	0.000 1 (1.062 9)
志愿者数量	0.006 4 *** (3.938 3)	0.003 7 * (1.945 5)	0.006 7 *** (3.243 4)	0.004 3 ** (2.025 3)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1 (0.339 2)	0.000 1 (0.477 6)	0.000 1 (0.332 8)	0.000 2 (0.879 3)
评估等级	0.000 2 (0.699 7)	0.000 5 (1.585 3)	0.000 6 ** (2.093 3)	0.000 7 ** (2.134 4)
常数项	0.034 5 *** (6.128 4)	0.053 2 *** (18.886 1)	0.021 7 *** (3.582 6)	0.049 6 *** (17.777 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1 285	673	1 285	673
<i>R</i> ²	0.309 5	0.187 7	0.180 3	0.154 5

正向影响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其中,有政府背景组政府资助 1 对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027 8,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无政府背景组为 0.078 5,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表 10 列(3)和列(4)中政府资助 2 的结果显示,政府资助 2 在有政府背景和无政府背景组织中均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发展,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4 1 和 0.006 3,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资助 2 的促进效应在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中显著强于无政府背景组织。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资助 2(资助占总收入比重)相较政府资助 1(资助金额)更直接反映了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与制度嵌入水平。具备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治资源获取、政策理解与行政协同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能够将高比例的政府资助转化为有效的组织治理能力与政策执行效率,从而实现更显著的绩效增长。相对而言,无政府背景组织在资源整合、制度适应与政策响应能力方面相对薄弱,高比例的政府资助可能带来“挤出效应”,从而削弱其资金使用的自主性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约束。

表 10 政治属性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有政府背景 - 无政府背景		有政府背景 - 无政府背景	
	(1) 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	(3) 高质量发展	(4) 高质量发展
政府资助 1	0.027 8 *** (6.961 1)	0.078 5 *** (10.190 5)	—	—
政府资助 2	—	—	0.014 1 ** (2.497 5)	0.006 3 *** (4.331 8)
<i>bdiff_test</i>	-0.008		0.003 *	
<i>P-value</i>	(p=0.410)		(p=0.090)	
基金会类型	0.012 7 * (1.783 8)	0.001 0 (0.633 6)	0.011 7 * (1.692 6)	0.000 1 (0.063 6)
全职员工数量	-0.000 0 (-0.097 7)	0.000 0 (0.156 4)	0.000 2 (0.547 9)	0.013 4 (1.352 3)
志愿者数量	0.000 1 * (1.819 3)	0.000 2 ** (2.103 5)	0.000 1 (1.122 4)	0.000 2 ** (2.170 6)
重大公益项目数	-0.000 0 (-0.002 6)	-0.000 2 (-0.910 5)	-0.000 1 (-0.238 3)	-0.000 3 (-1.047 2)
评估等级	0.000 7 (0.894 2)	0.005 5 *** (4.500 0)	0.002 4 ** (2.222 1)	0.006 6 *** (4.054 7)
常数项	0.044 9 (1.133 9)	0.047 9 * (1.756 4)	0.038 6 (1.047 0)	0.100 0 ** (2.409 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230	1 728	230	1 728
<i>R</i> ²	0.641 9	0.393 1	0.580 3	0.224 7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1)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资助显著促进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正向作用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所带来的财务稳定性提升,更体现为组织专业化水平的增强及其在公益服务供给能力方面的显著改善。

(2)使命偏离在政府资助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政府资助引导社会组织优化资源配置与战略定位,有意识地重塑和聚焦原有使命,提升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与战略导向性,从而增强资源配置精准性和治理结构适配性,推动治理绩效和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资助通过约束机制降低了社会组织在外部资源压力下的盲目性与漂移风险,防止组织核心使命的弱化或失焦。

(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政府资助作用机制的影响相对有限,无论组织处于“支持型”还是“限制型”制度背景,政府资助对其高质量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在政治属性方面,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在高比例政府资助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效应

要优于无政府背景组织,表明政治属性通过提升对政府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制度嵌入程度,有效增强了政府资助的边际效应。

(二) 政策启示

一是加大政府资助的范围和资金规模。政府可以在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门的社会组织专项发展资金,用于支持不同类型和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将更多的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目录。同时,明确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一定比例。

二是强化政府资助的引导和规范功能。引导社会组织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公益目标主动调整宗旨使命和优化资源配置,助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此同时,注重将“监管融入服务”,在资助过程中除了对公益项目产出的要求之外,同时围绕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维度设计相关验收和评价指标,将政府资助纳入社会组织质量提升工程。

三是增加政府资助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加强社会组织监管的背景下持续对社会组织开展资助,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的同时,利用政府资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背景社会组织的示范作用,不断强化社会的政治意识、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适当提高社会组织申请政府资助的门槛,对于政治过硬、作用明显、贡献突出的社会组织进行优先资助。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本文收集了 2012—2021 年全国范围内 414 家基金会的面板数据,但在数据处理后,仅保留了 1 958 条有效观测值。数据的删减主要是由于社会组织数据中的异常值和离群值过多,导致数据清洗后许多样本仅涵盖 1~2 年的时间跨度。这一数据局限性使得本研究难以深入挖掘政府资助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此外,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集中于基金会。虽然基金会在社会组织中

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研究结果并无法全面反映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通过采取多样化的数据收集方法,如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田野调查等,弥补现有数据的不足,从而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和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

- [1]黄六招. 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动因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9(3):56-74.
- [2]ANDREONI J, PAYNE A A. Do government grant to private charities crowd out giving or fundrais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3):792-812.
- [3]ECER S, MAGRO M, SARPÇA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profits' revenue composition and their economic-financial efficiency[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7, 46(1): 141-155.
- [4]吴中盛,朱飞宇. 挤入抑或挤出:政府资助对基金会所获金钱捐赠和时间捐赠的影响[J]. 公共管理评论,2024,6(4):256-281.
- [5]蔡潇彬. 中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J]. 新视野,2020(3):101-106.
- [6]BROOKS A C. Public subsidies and charitable giving: crowding out, crowding in, or both? [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00, 19(3): 451-464.
- [7]BORGONOV F. Do public grants to American theatres crowd-out private donations? [J]. Public choice, 2006, 126(3): 429-451.
- [8]刘玉焕,井润田,卢芳妹. 混合社会组织合法性的获取:基于壹基金的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4(6): 67-80.
- [9]JONES M B.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mission drift[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7, 36(2): 299-307.
- [10]CORNFORTH C.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mission drift in social enterprises[J].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2014, 10(1): 3-20.
- [11]RAMRAYKA L. Can the third sector do more with less? [J]. Guardian, 2010(2): 1-3.
- [12]EBRAHIM A, BATTILANA J, MAIR J.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mission drift and accountability challenge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34): 81-100.
- [13]GRIMES M G, WILLIAMS T A, ZHAO E Y. Anchors aweigh: the sources, variety, and challenges of mission drif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9, 44(4): 819-845.
- [14]GRØNBJERG K. Understanding nonprofit funding: managing resources in social servic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M].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1993:78-79, 170-172, 191-192.
- [15]SMITH S, LIPSKY M. Nonprofits for hir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84-187.
- [16]HERNANDEZ ORTIZ T L, APPE S. Coercive and mimetic isomorphic mechanisms for service provision: the cre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Mexico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25,40(1):126-150.
- [17]WHITE R F.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ission creep: the common rul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nanny state[J]. The independent review, 2007, 11(4): 547-564.
- [18]石国亮,廖鸿. 推动新时代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J]. 理论与改革,2019(1):35-43.
- [19]毛佩瑾.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成效、特征与创新路径[J]. 宁夏社会科学,2024(5):163-172.
- [20]田丹,丁宝.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组织韧性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2023(9): 154-170.
- [21]杨永芳,王秦. 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4(S1):182-190.
- [22]李健,陈淑娟. 如何提升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绩效?:基于资源依赖与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2017,14(2):71-80,156.
- [23]李健,张文婷. 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扩散研究:基于全国31省数据的事件史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9(5): 60-67.
- [24]李迎生. 党的领导与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5):76-84.
- [25]柴一凡. 以有效监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J]. 中国行政管理,2021(4):59-64.
- [26]YU J, SHEN Y, LI Y.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central government funding on the service and advocacy rol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21, 50(1): 186-212.

- [27]李健,成鸿庚,贾孟媛. 间断均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变迁:基于 1950-2017 年我国社会组织政策考察[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2):66-71.
- [28]HILLMAN A J, WITHERS M C, COLLINS B J.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6): 1404-1427.
- [29]BENNETT R, SAVANI S. Surviving mission drift: how charities can turn dependence on government contract funding to their own advantage[J].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011, 22(2): 217-231.
- [30]黄晓春,周黎安. 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1):118-138,206-207.
- [31]AWAIS M, ALI A, KHATTAK M S, et al.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on[J]. *Sage Open*, 2023, 13(2): 1-17.
- [32]王青松,葛玉琴. 政府资助与社会组织管理效率:基于中国基金会的实证研究[J]. 财务与金融,2022(1):42-49.
- [33]QIAN Y, XU C. 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65(1): 151-164.
- [34]LU J, ZHAO J. Does government funding make nonprofits administratively inefficient? revisiting the link[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9, 48(6): 1143-1161.
- [35]ZHU Q, CORDEIRO J, SARKIS J.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investigating the ISO 9000-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ation linkag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114): 232-242.
- [36]DEEPHOUSE D L, SUCHMAN M. Legitimacy in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2008:50-54, 61-62.
- [37]POST M A, BORIS E T. Nonprofit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roles of 501 (c)(4)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in elections and policymaking[J]. *Nonprofit policy forum*, 2023, 14(2): 131-155.
- [38]冯怡,刘弦汝. PEST-SWOT 分析框架下西藏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5(2):79-86.
- [39]郭施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基于能力专有性视角[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5(1):206-212.
- [40]张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8,34(8):99-105.
- [41]LUKSETICH W. Government funding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8, 37(3): 434-442.
- [42]LECY J D, VAN SLYKE D M. Nonprofit sector growth and density: testing theories of government support[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3, 23(1): 189-214.
- [43]CHAVESC M, STEPHENS L, GALASKIEWICZ J. Does government funding suppress nonprofits' political activ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69(2): 292-316.
- [44]WU M, ZHANG L, LI W, et al. How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ffect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of green management practice[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9): 12086.
- [45]BASU S, MEGHANI A, SIDDIQI A. Evaluating the health impact of large-scale public policy changes: classical and novel approaches[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7, 38(1): 351-370.
- [46]YANG X, HE L, TIAN S, et 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r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index: using functional data analysis method[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1(154): 559-582.
- [47]ZHANG J, ZHANG W, SCHWAB A, et 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PO strategy: a study of ChiNext in China[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7, 13(2): 399-430.
- [48]李健,佟育霖,宋丽朱. 政策体制视角下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J]. 学习与实践,2024(8):97-107.
- [49]宫晓辰,孙涛,叶士华. 政治关联可以提升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吗?:基于收入多样性的中介效应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1):131-144.
- [50]LU J. Which nonprofit gets more government funding? Nonprofits'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and their receipts of government funding[J].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015, 25(3): 297-312.

(本文责编:希 文)